

## 1.1 百年傳承——細說白文信貢獻

筆者心中堪稱「大醫」者，從頭細數，可由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前身、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首任院長白文信（Patrick Manson）說起。

除了有幸繼承白文信育醫造才的使命，當上第四十任院長，自覺與這位創院大醫也稱得上格外有緣。所謂緣份，或許只是蛛絲馬跡，可在有心人看來，卻像冥冥中埋下的伏線，牽引隔時空的邂逅。

### 為香港倫敦創辦醫學及公 學院

2003年筆者在香港大學考獲醫學博士學位。根據傳統，應屆最佳畢業論文得主獲授白文信爵士金牌（Sir Patrick Manson Gold Medal），第一次看見自己的名字與同當公共衛生醫生的白文信並列，印在畢業禮冊子上，也難免心情起伏。

白文信在香港創辦華人西醫書院，回國後又於1899年興辦了另一所世界級學府——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（London School of

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，簡稱倫衛院）。2014年筆者代表港大跟倫衛院正式簽訂學術科研合作協議，隔世百載，遠渡萬里，白文信與他親手奠基的兩所學校仍然緣份未了。

白文信享有「熱帶醫學之父」的稱號，他對絲蟲病的獨到研究，成為日後的傳染病學、寄生蟲學、流行病學的基礎。在殖民史上，歐洲人一向對瘧疾聞之色變，白文信曾與軍官羅斯（Ronald Ross）合作研究，發現蚊子是瘧原蟲的宿主，羅斯更憑此獲諾貝爾醫學獎。其師父白文信不曾分得榮譽，只繼續辦學授課，為大英帝國駐外人員提供醫療訓練。

1883年白文信離開廈門、來到香港的時候，薄扶林岸邊還是一片荒地，裸露出赭紅的岩石，遠航來的商船可以長驅直入。如果今天很難想像如此風景，不妨去看錢納利（George Chinnery）的風景畫，也可領略一二。白文信從老家蘇格蘭運乳牛來港，即在伯大尼修院（Béthanie）上岸，他創辦的牛奶公司也發跡於此——誰想得到，2002年開始成為演藝學院學生上課和眾多新人拍婚紗照的勝地，曾經是修道院、療養院和牛棚？彼時渾無城市建設的配套，有的是田園野趣和自給自足的和諧：修士誦經，醫生治病，還兼職養牛擠奶。

當年的牛棚今已改建成劇院。十多年前我踏足伯大尼，並非出席甚麼學術場合，卻是為了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實況演出（Met Live）在香港轉播，當年更是首次在復修後的伯大尼古蹟上映。身為古典音樂樂迷，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。身處簇新的劇院，眼觀舞台華麗，

耳聽弦樂續紛之際，忽有一刻出神，想起百多年前白文信卻在此地養牛。「蕭條異代不同時」，前人種樹，卻永遠也看不到身後這片煥然全新的天地，他曾否有過一絲遺憾？

### 開創牛奶公司

除了港大醫學院的人，香港人可能不太熟悉白文信的名字，但他創辦的牛奶公司家喻戶曉。乳牛運抵後不久，牛奶公司又在中環的下亞厘畢道興建冷庫，保證新鮮牛奶的品質，日後更引入凍肉，提供冰塊。到上世紀 60 年代開設第一間超級市場大利連，後更於 1972 年為怡和集團收購，才成為香港首屈一指的零售集團。

維多利亞晚期的英國人篤信牛奶富有營養。白文信身在異鄉，眼見香港人口增長，城市新興，事事親力親為，搭牛棚、蓋倉庫，讓人人都喝得上新鮮衛生的牛奶，一片苦心，全為異鄉奉獻，足為後人感念。

但過了一個多世紀，此風不消反長，即使已有本土醫學研究指出成年華人消化系統缺乏消化乳糖的酵素，喝牛奶不見得有益，甚至有可能促成心血管慢性病<sup>1</sup>，但維多利亞時代的觀念至今牢不可破。乳業的政治說客果真法力無邊，還是習慣和成見足以令人忽視理性思考？

普及公共衛生的理想，不論在歐洲抑或華人社會，今天總算逐步實

現了，但公眾的健康常識，對疾病的認識和現代公共衛生的理解，真能談得上與時俱進？當年白文信憑自己的信念，曾在香港移風易俗，我們今天這一代也應承傳接棒，擔起時代使命，像白文信般勇於開拓，推動新的實證醫學觀念，與前人遙相呼應。所謂緣份，也應如此吧。

---

1 筆者領導的研究團隊進行「九七的兒女」追蹤研究，及在廣州的相關研究中，曾探討飲用牛奶與兒童過胖和心血管毛病的關係，發現牛奶的作用並不明顯。  
(<http://www.ncbi.nlm.nih.gov/pubmed/2328509> 和 <http://www.ncbi.nlm.nih.gov/pubmed/2441629>)

## 1.2 心繫香港的蘇格蘭「香港仔」

從醫學院或瑪麗醫院遠眺，眼底是香港仔的一灣淺淺海水。「香港仔」三字，富有本地語言色彩，對照的英文名，卻是蘇格蘭地名「亞巴甸」（Aberdeen）。兩者好像風馬牛不相及，其實不然。

港大醫學院與蘇格蘭關係匪淺，不止在一個地名上有巧妙連接，還有千絲萬縷的人際關係形成的引力，令香港仔與亞巴甸像一對遙相呼應的雙子星。

從蘇格蘭亞巴甸來到香港的人，除了港大醫學院前身——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首任院長白文信，還有他的校友何啟，兩人均學成於蘇格蘭亞巴甸大學醫學院（University of Aberdeen School of Medicine）。

### 留英華人何啟興建西式醫院

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建成，可說是得於何啟之失。

何啟之名，恐今人知之未詳，其實在香港歷史上佔有重要一席，啟德機場的「啟」字，即得名於此君。何啟祖籍廣東南海，父親何福堂是第一代華人牧師，家風頗為西化，何啟十三歲時就被送去英國讀寄宿學校——以後世華人子弟留英的潮流而言，堪稱開風氣之先。

何啟身為華人，自我培育成標準的維多利亞紳士，生時富有萬金，死時不名一文。他在亞巴甸大學醫科畢業後，又往倫敦學習法律，與貴族出身的雅麗氏（Alice Walkden）小姐結婚。如按港英時代甚至當下香港對「成功人士」的一般定義，實在堪稱典範：「富二代」出身，受英國教育，擁有醫科與法律的「雙神科」學位，成功躋身上流社會。

何啟攜夫人回港後，躊躇滿志，一心要做番事業，興建西式教會醫院，服務華人社群。此議遭到頑固的傳統中醫藥勢力及未曾嘗過西洋醫術的民眾抵制，何啟與白文信極力斡旋，不想風波竟因一件不幸事情才告平息：何夫人雅麗氏傷寒病逝。

雅麗氏遠道來港才三年，對新家園尚未熟悉，何啟不勝悲痛，捐出醫院的全部建築費用，要求醫院以妻子命名，以使香港人不忘她的名字，即雅麗氏利濟醫院（Alice Memorial Hospital）。1887年醫院落成，又擴充校舍，醫學院乃告正式成立，雅麗氏利濟醫院順理成章成為醫學院的第一所教學醫院。這年收的第一批學生當中，有孫中山。

根據白文信的記述，醫院啟用之初，門診病人絡繹不絕，病牀迅即額滿。在最初的三年間，醫院處於本地醫師與西式醫學兩派對立的夾縫中，加上兼顧教學、醫療、傳教，殊為不易，卻建立起獨有的模式：既非教會醫院，又不同於社區醫院，而是一種混合體。到了1906年，雅麗氏利濟醫院已經擁擠不堪，亟需擴建，獲政府撥出卑利士道一塊地皮，毗鄰那打素醫院，另建新院，何啟的妹妹何妙齡慷慨捐出全部建築費用。1954年，雅麗氏、何妙齡與那打素三家醫院正式合併，至於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更是後話了。

### 奕信回歸後繼續與港結緣

還有一位「亞巴甸人」（又是一名另類「香港仔」）與香港淵源深厚，他正是前港督衛奕信勳爵（Lord Wilson of Tillyorn）。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，衛奕信身在蘇格蘭故鄉，正好受命擔任亞巴甸大學校監（Chancellor）。白文信、何啟，還有營救過孫中山的康德黎（James Cantlie）均於亞巴甸醫學院肄業，並合力創辦香港華人西醫書院，故包括今天的衛奕信，都與亞巴甸這家大學結緣，要說亞大是港大醫學院之母，也不誇張。

2015年2月衛奕信八十大壽，筆者適逢造訪劍橋大學，得劍大歷史最悠久的書院彼得豪斯（Peterhouse）當時的院長、放射診斷科專家 Adrian Dixon 教授盛情邀請留宿。原來是為衛奕信祝壽舉辦生日會，可惜行程不允，只好錯過機會，當時心中非常遺憾。不料數月後，竟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與他重逢。那天是聖保羅大教堂學校

（St. Paul's Cathedral School）的結業禮，晚禱會上他正好在場，這才得以彌補早前之憾。

衛奕信卸任後，二十多年來不時回港探問。他喜歡跟香港人聊天，還常為香港的事務發聲。是否心繫香港？他未曾宣之於口。

偶然思及這幾位「亞巴甸人」，也會想像他們當初離開蘇格蘭寒冷的北海，來到溫暖的香港南岸，面對人物全非，把此地改名亞巴甸的時候，可能也有過一絲思鄉病？懷舊是一種情緒，今天的人傾向美化過去，但歷史客觀的一面也不容忽視。香港是英國殖民史的一部份，他們來香港不是為了尋找新家園，而是懷有確實的任務。理性與感性的界線，會因時間而模糊，他們留下的遺產，卻造福了今天。

### 1.3 營救孫中山的良師

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的創始人向來有「鐵三角」之說。此前寫過白文信與何啟，還有一位，便是教過孫中山的康德黎。巧合是，白文信、何啟與康德黎皆是亞巴甸大學不同時期的同窗。孫中山後來在倫敦遭清廷綁架，康德黎出力營救，得以留名中國史冊。

康德黎與白文信同是蘇格蘭人。維多利亞時代蘇格蘭醫生在英國殖民地醫療領域堪稱一派重要勢力，與白文信同期的亞巴甸大學十九名畢業生中，十人都選擇遠赴各殖民地效力<sup>1</sup>。這主要是因為倫敦的皇家內科及外科學院，一向由英格蘭大學訓練出來的醫生把持，迫使蘇格蘭醫生情願往海外一闖<sup>2</sup>。

康德黎的本業是解剖學，在香港華人西醫書院亦教授外科。他天生該當老師，據說他的課堂有如表演，氣氛甚為活潑，他還喜歡在課堂上演屍體解剖，為思想保守的華人學生帶來極大挑戰。

#### 全職教學打破香港傳統

他不但個人風格突出，最與眾不同之處，在於他是全校唯一一位擁有現代醫學教學經驗的老師。他的到來，為香港引入了當時西方社會的新興觀念：即醫學院教授應由全職人員出任，不再依靠兼職的執業醫生。醫學生必須接受基本科學教育，在學習外科手術之前，先要透徹學習自然科學；加上臨牀教學漸由專職人員擔任，這一切觀念轉變，都促使師資要求提高：教師必須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，才能應付嚴格的訓練課程。

反觀當時的西醫書院，大多由外籍醫生兼任教職，這些醫生旅居華南多年，富有本土執業經驗，專門針對華人學生和臨牀需求施教，但其授課水準與現代醫科教學有一定距離。他們本身醫務繁忙，除了為口奔馳，政府又頻頻向他們招手邀任公職，更難專心教學，以致創校之初人事更迭頻繁，甚為煩擾<sup>3</sup>。

康德黎一心一意辦學教書，因為他的緣故，至少三個學科稱得上基礎穩健：解剖學、臨牀醫藥，以及外科。康德黎也十分關注學生畢業後的前途，在1892年第一屆畢業典禮上，他在致辭中懇請港英政府認可畢業生的醫生資格，而不僅是頒發執業許可證。他目光深遠，相信西醫書院的價值超越香港本身，更有助於在龐大的中國，叩開現代醫學之門<sup>4</sup>。